

《章实斋遗书》在晚清民初的流传及作用

——以缪荃孙致柯逢时二封书札为中心

陈立军

内容摘要:光绪初年《章实斋遗书》从绍兴私人藏书楼中流出,受修《湖北通志》的影响,引起湖北一带学者的重视,成为纂修《湖北通志》的资料来源与体例借鉴。柯逢时、缪荃孙等人相互传抄《章实斋遗书》,又使《章实斋遗书》在晚清民初由江浙、两湖流入北京,与《文史通义》的研究形成前后呼应之势,为“章学诚热”的到来奠定文献基础。

关键词:《章实斋遗书》 缪荃孙 柯逢时

章学诚临终前,曾将手稿托付王宗炎编订。王宗炎既釐定出一卷目录,又录得一部副本^①。道光六年(1826),章学诚次子华绂发现王宗炎所订目录有遗漏,并与原编篇次互异,想要恢复其本来面目,便根据手稿誊录副本,但当抄至十六册时原稿遗失,仅以十六册副本作底本删取刊成《文史通义》流布于世^②。之后,《文史通义》借助伍崇曜《粤雅堂丛书》的影响力^③,在浙江学者、湖南书商和上海书商的不断翻刻下,于咸同年间开始在学界广为流传。而在原稿遗失后,王宗炎所订副本成为当时尚存较为完整的章学诚遗书,但是它却隐没于绍兴一隅而不彰,迟至光绪初年,受编修《湖北通志》的影响,才引起学者的重视。

目前学界对《文史通义》版本与流传的研究已经十分深入,尤其是章学诚自刻本《文史通义》的发现,极大推动了章学诚学术史的研究^④。但是,有关王

①王宗炎:《王宗炎复书》,《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24页。

②章华绂:《文史通义·序》,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9页。

③倪德卫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0页。

④张述祖:《〈文史通义〉版本考》,《史学年报》1940年12月第3卷第1期。梁继红:《朱锡庚抄本〈章氏遗著〉及其利用价值》,《文献》2005年第2期。

宗炎所订副本的研究,却仍停留在索引、版本罗列的阶段^①,甚至一些只存书名而不具实物的版本都未能指出^②。有鉴于此,笔者拟以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缪荃孙致柯逢时的书信为切入点,考察王宗炎所订副本在晚清民初的流传及其作用。

一、缪荃孙致柯逢时书札小考

北京大学图书馆现藏一部王宗炎编订的《章实斋遗书》三十卷抄本(藏书号:NC/9117/0470.1)。此抄本为1932年夏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侯云圻从武昌柯氏处购得。第一册目录前有“柯逢时印”,封面题识云:“光绪癸未,从章硕卿藏本借抄,已刻者未钞,共十四册”,附“柯逢时印”。第一册目录页前粘有缪荃孙致柯逢时信函两封、姚陛闻笺一。这些书札的价值在于,可与缪荃孙的《日记》相印证,考见缪荃孙与柯逢时的学术交往。然而,最新出版的《缪荃孙全集》^③并未将它们收入。

现将三通书札彙录如下:

逊庵仁兄大人阁下:

实斋先生稿本,先奉还廿册,乞督入,餘竣录毕再缴。葆初能刻,甚善,然书不全,闻旧稿在石卿所,不知归于何处,石卿在鄂,可一询也。葆初所刻《文馆词林》,兄见之否?《贞石志》收入续志,有条理否?此请轺安!

荃孙顿首。

逊庵仁兄大人阁下:

前假章先生遗书,尚有八本,乞督入。弟自南来,疲乏已极,竣道稍干,再请登堂畅谈也。此上,即请台安!

弟缪荃孙顿首。

柯大人:

章先生书一册奉缴。上月,甫由幼叔同年处索来也。□□安我兄同年鉴。

弟姚陛闻顿首。

从缪荃孙二札可知,他曾向柯逢时借得《章实斋遗书》二十八册,但现在北大所藏抄本以及封面题识却说只有十四册。封面题识言“已刻者未钞”。据北

①如鲍永军《章学诚研究论文著作索引1810-2003》(《章学诚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于延亮《章学诚著述整理简述》(《浙江历史文化研究(第三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覃晓亭《章学诚史学理论的近代“发现”与解读》附《章学诚著作刊行流传情况》(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②如沈复槃之子所抄《实斋杂著》、萧穆所藏三十卷《章氏遗书》本等。

③张廷银、朱玉麟主编:《缪荃孙全集·诗文》之《艺风堂书札》,凤凰出版社,2014年。

大所藏《章氏遗书目录》看,已刻的文章都会在各卷文章篇名的右下方写下“已刻”二字,便不再收入正文中。综合各卷标出的已刻文章篇目可知,北大所藏抄本不包括当时流行的刻本《文史通义》和《校讎通义》。由于国内各大图书馆未见有此缪荃孙所借二十八册本,所以笔者无法准确并详细地指出二十八册本与北大所藏十四册本之间具体的差异之所在。但从北大所藏《章氏遗书目录》看,缪荃孙借阅的二十八册本很有可能收入了这些“已刻者”,从而使两个版本在篇章数量上有差别。

杨寿昌,字葆初,成都人。章寿康(1849-1906),字石卿,亦字硕卿,会稽人。侯云圻跋《章实斋遗书》稿本云:“硕卿于光绪丁丑(三年)捆书至鄂,乙酉(十一年)宰嘉鱼,以劾解职,故缪函云‘硕卿在鄂’,盖此时也。”^①侯云圻所言章寿康的履历,实出自缪荃孙《章硕卿传》。《章硕卿传》言:“丁丑(1877),君以知县分发湖北,入都引见……君携巨资广收书籍……捆百箱出都。到鄂丁父艰,仍旋蜀^②,所刻亦渐富。乙酉(1885),再回鄂中,补嘉鱼县知县。”^③然据《申报》所载《鄂省官报》,章寿康于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二十七日,以候补知县“奉委办通志局文案兼收掌办理文案差”,可知章寿康早在此前已由北京抵达武昌,至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方补嘉鱼县实缺^④,故《章硕卿传》所记“乙酉”有误。

由侯云圻的跋语可知,他是根据章寿康知嘉鱼县的时间,推断第一封信札的写作时间。按《申报》载,光绪十四年(1888)正月十七日章寿康被革职,九月二十二日“完款开复”后离开嘉鱼,赴广州投奔张之洞^⑤。恰是在这年八月二日,柯逢时允借《章实斋全集》。至八月四日交与缪荃孙后,柯逢时便离京至陕任学政,而缪荃孙则于八月八日扶“先母及亡室柩”自京归里^⑥。从光绪十四年始,《缪荃孙日记》每一日都有确切的记载。在光绪十四年八月十日、十一日,缪荃孙阅读过《实斋文集》,《章实斋遗书》再次在《日记》中出现已是五年后,即光绪十九年二月七日,所以单据章寿康宰嘉鱼县推断第一封书札的时间是有问题的。

章寿康所藏《实斋遗书》是由其弟章善庆所购,章善庆病亡,此本方转归章寿康,但是萧穆所记此事在时间上有出入。《记章氏遗书》载光绪十八年(1892)九月十一日章善庆病歿,“身后书物均归其兄石卿大令寿康”^⑦;而《章学诚事略

①《燕京学报》1932年4月30日第28期,第1页。

②据缪荃孙《章硕卿传》,章寿康之父章雅瀛长期在四川任官(《缪荃孙全集·诗文》第1册,第484页)。章氏一家或已寓居四川,故其至蜀服丧。

③《缪荃孙全集·诗文》第1册,第484页。

④《申报》1885年3月13日第2版、1886年5月1日第9版。

⑤《申报》1888年2月28日第9版、1888年10月10日第12版。

⑥《缪荃孙全集·日记》第1册,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269页。

⑦萧穆:《敬孚类稿》卷九,《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3辑,文海出版社,1986年,第458页。

及遗书本末》却载“光绪甲午年(1894),小雅病歿,书又归诸乃兄寿康”^①。然据《缪荃孙日记》,缪荃孙在上海最后一次探望章善庆时,章善庆已“病日深,殆不能久”,时在光绪十八年三月十六日^②。以此推断,章善庆病歿于光绪十八年应得其实。那么,缪荃孙信札所言“闻旧稿在石卿所”当是光绪十八年九月之后事。而杨寿昌将新刻《文馆词林》赠予缪荃孙,时在光绪十九年七月十三日^③。故缪荃孙将二十册《遗书》交予柯逢时即第一封书札的写作时间,大致在光绪十八年九月至光绪十九年七月之间。

信札所言“续志”,指《常山贞石续志》。由信札可知,缪荃孙是想将《续志》收入《常山贞石志》中,但柯逢时光绪二十五(1899)年所刻《贞石志》并没有收《续志》。光绪二十五年六月,缪荃孙致信凌霞言“《常山续志》稿本未成,尚在柯劭忞处,今年方能脱稿”^④。这部未定稿《续志》原应由柯逢时从柯劭忞处带回交给缪荃孙,但由于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华占领北京,柯劭忞匆忙离京,并没有带出^⑤,此后《续志》不知去向。

第二封书札的时间基本可以确定,在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十五日。由于官场失意以及甲午战争爆发,缪荃孙打算辞官,将眷属从北京接回江阴。九月十日,他从江阴回到京城,“家中大小安好,因日本信息较恶,惊皇特甚”,十一日至于十四日又多雨,故信札有“弟自南来,疲乏已极,埃道稍干”之语。至十五日晴,缪荃孙便将后八册《遗书》还与柯逢时^⑥。

第三封信札主要反映了柯逢时抄本向外出借的情况。章法护(1856-?),字幼叔,号季珣,安徽来安人,光绪九年第三甲进士,与缪荃孙、郑孝胥、叶昌炽等均有密切往来。从信札来看,姚陛闻与章法护、柯逢时两人均是同年。姚陛闻,浙江归安人,光绪十七年举人^⑦,与杨寿昌、傅增湘等人参加过康有为领导的北京保国会。

二、缪荃孙、柯逢时与《章实斋遗书》

柯逢时与《章实斋遗书》的缘分始于编修《湖北通志》。光绪七年(1881),湖北巡抚彭祖贤倡修《湖北通志》,聘请陶方琦为总纂,姚振宗、柯逢时、杨守敬等人兼修。由于此差使,柯逢时开始了解章学诚及其《湖北通志》,并有馀钱购买古书,走上藏书之路^⑧。而与柯逢时共事的陶方琦、姚振宗,都是熟知章学诚

①吴庆坻:《蕉廊胜录》卷五,中华书局,1990年,第161页。

②《缪荃孙全集·日记》第1册,第205页。

③《缪荃孙全集·日记》第1册,第269页。

④张廷银:《缪荃孙致凌霞函札释读》,《文献》2010年第2期,第156页。

⑤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07页。

⑥《缪荃孙全集·日记》第1册,第325页。

⑦《浙江乡试题名全录》,《申报》1891年10月17日第2版。

⑧殷应庚、黄健:《柯逢时年谱》,《江汉考古》1989年第1期,第79页。

及其遗著的浙江学人。陶方琦曾于同治十一年(1873)协助谭献搜讨章华绂所刻《文史通义》的书板^①,而姚振宗则深谙目录学,尤为重视《校讎通义》,在所著《〈隋书经籍志〉考证》中屡次称引此书,二人足以影响柯逢时对章学诚的认知。光绪八年(1882),章学诚后人章季真路过武昌,彭祖贤假章季真所藏《湖北通志稿》,校以叶名沔抄本,交武昌官书局排印^②。此外,章季真还随身携带有一部章学诚的手稿本《文钞》^③。可见,在抄章寿康藏本以前,柯逢时已接触过其他版本的章氏遗书,对于章学诚及其著作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

恰逢章寿康父亲章雅瀛病逝,章寿康将藏书运至武昌,在成都、武昌两地刻板印书^④,柯逢时才有了机会接触他的传抄本《遗书》。彭祖贤为缪荃孙“世丈”,缪荃孙视章寿康为“同志”、“知己”,而柯逢时又与章寿康志趣相投,都钟情于藏书、刻书。故柯逢时凭借与章寿康共同的志趣以及缪荃孙和章寿康的关系,才在光绪九年借抄到《章氏遗书》。次年,章寿康以候补知县入通志局办差当与柯逢时有关。

由于彭祖贤去世,修志事延宕。至光绪十四年六月,两湖总督裕禄在北京聘请缪荃孙与柯逢时同修《湖北通志》,缪荃孙才有机会见到《实斋遗书》。《缪荃孙日记》载,此年八月四日,柯逢时因简放陕西学政不能兼修通志,所以在离京前将《湖北通志稿》、《章实斋遗书》一并交与缪荃孙^⑤。由此可知,《章实斋遗书》一直被柯逢时等人视为编修《湖北通志》最重要的参考资料。然而,对于此时缪荃孙而言,《章实斋遗书》的意义不止于此。缪荃孙在修《通志》时,还为盛宣怀纂辑《经世文编续编》,以及承担国史馆《文苑传》章学诚传的撰写工作^⑥。这两项工作同样需要章学诚的文集作材料支撑。

在晚清士人眼中,缪荃孙是一位熟知章学诚著作版本的“通人”。光绪二年(1873),协助章季真刻《文史通义》的王秉恩赴京拜访缪荃孙,托他寻求《文史通义》校本,缪荃孙就告之周寿昌藏有一部较粤雅堂刻本《文史通义》篇章为多的抄本^⑦,而且缪荃孙自己还藏有一部《丙辰札记》传抄本^⑧。缪荃孙是从史学而非文章或经学的角度来审视章学诚遗著的。在修订《书目答问》时,初入版本目录的他就已将章学诚视为史学家,把《文史通义》著于史评类^⑨。正是基于此价值取向,缪荃孙倾心于章学诚对史法的讨论,尤其是有关“例”的论述,

①《谭献日记》,中华书局,2013年,第53页。

②彭祖贤:《〈湖北通志稿〉跋》,《章学诚遗书》,第623页。

③王秉必:《〈章实斋文钞〉识语》,《章实斋文钞》,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藏本,索书号:25288。

④缪荃孙:《章寿康传》,《缪荃孙全集·诗文》第1册,第484页。

⑤《缪荃孙全集·日记》第1册,第29、30页。

⑥《艺风老人年谱》,《缪荃孙全集·杂著》,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176、177页。

⑦王秉恩:《〈文史通义〉跋》,《章学诚遗书》,第622页。

⑧缪荃孙:《艺风藏书记》,《缪荃孙全集·目录》,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187页。

⑨张之洞著、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7页。

如史例、编文集例与修方志例,屡引作论据并加以引申。如,他认为编次文集“以最实者居先,空论居末。骈文词浮于事,故不另编”,就引用章学诚《丙辰札记》“古人编集,必有宗旨,不必尽学《文选》以赋居首”作论据^①,反映了缪荃孙对章学诚学术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三、《章实斋遗书》在晚清民初的流传与作用

柯逢时所抄十四册本、二十八册本《遗书》,均出自章寿康藏本,而章寿康藏本是由其弟章善庆在绍兴书坊中购得。此本原“为其乡人沈霞西家藏本”,沈氏家道中落,“此遗书乃留落绍兴本城某书坊”^②。沈复桢(1779-1850),字霞西,绍兴山阴东浦人。有学者已注意到沈复桢在《章氏遗书》流传过程中的地位,认为他是一位关键性的人物,不仅从章学诚长子章贻选处抄得《信摭》等,还收藏了这部“为后世刊印章学诚著作奠定文献基础”的《遗书》^③。但是,从沈复桢到“后世刊印”中间经过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却被忽略了。《实斋遗书》原由章贻选收藏,经沈复桢私人藏书楼鸣野山房流出后,开始进入学人的视野。

王宗炎(1755-1826),字以除,浙江绍兴萧山人。章学诚将手稿托他编订,原因之一就是地利之便。王宗炎在征求章学诚、臧庸等人的意见后,既编出一卷目录,又誊录一部副本。章学诚去世,章家后人便将原稿、目录及副本一并索回。王宗炎对《章氏遗书》的贡献在于,既确定了《遗书》的篇目和结构,还为后世留下一部可供参考的校本。王宗炎在编辑原稿时择抄出部分篇章汇为一帙,即“十万卷楼”本^④。王宗炎死后,十万卷楼本先归山阴平步青安越堂,1943年周作人从杭州书肆收购^⑤,其后才转藏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同时,王宗炎还是《章氏遗书》的一位塑造者,《王宗炎复书》云:

至于编次之例,拟分内、外二篇。内篇又别为子目者四:曰《文史通义》,凡论文之作附焉;曰《方志略例》,凡论志之作附焉;曰《校雠通义》;曰《史籍考叙录》。其余铭志叙记之文,择其有关系者,录为外篇,而以《湖北通志》传稿附之。此区区论录之大概也。惟是稿本丛萃,而又半无目录,卷帙浩繁,体例复杂,必须遍览一二过,方能定其去取。拟编出清目,俟稍有就续,当先奉请尊裁。至于缮录,此时却无稳妥之人,缘大作无副本,不敢轻以示人,恐有损失,非细故也。总之,编次既定,缮录不妨稍需时日。^⑥

①缪荃孙:《致李祥》,《缪荃孙全集·诗文》第2册,第363页。

②萧穆:《敬孚类稿》卷九,《记章氏遗书》,第457页。

③潘建国:《沈复桢鸣野山房藏书考略》,《文献》2008年第4期,第51页。

④阳海清:《中国丛书广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上册第624页。

⑤周作人:《〈文史通义〉逸文二篇跋》,《周作人集外文》,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第570页。

⑥王宗炎:《王宗炎复书》,《章学诚遗书》,第624页。

这段材料反映了王宗炎对章学诚原稿去取分类的过程。在誊录副本时,他还对部分文字进行过编辑加工。因此,将王宗炎所订副本视为作者章学诚与编辑者王宗炎共同完成的作品也不为过。王宗炎所定上述体例,成为后人编订章学诚遗书的一个范例,而此书札所展现的编订书稿之程式,颇受缪荃孙赞赏,对他具有启发意义。缪荃孙负责编纂的《常州先哲遗书》基本上就是在这一程式下展开工作的。

章家后人没有守住章学诚的书稿。原稿在章华绂抄出十六册后,被其弟章华练在河南卖掉而不知所踪^①。王宗炎所订副本的命运虽与之相似,被章贻选转让给沈复桤,但二者结果却不尽相同。经沈复桤之手,以此副本为底本衍生出的传抄本,在以他为中心的关系网中扩散开来。沈复桤之子所抄《实斋杂著》,后转归会稽安城杨氏“秘藏”^②。同治八年(1869),李慈铭通过朱厚斋的关系借到这部抄本^③。阅读后,李慈铭在《日记》同治八年三月十二日条和《与谭仲修书》等文字中,对章学诚的“谬论”展开条分缕析式的批驳,远早于章太炎《与人论国书》^④数十年。

“潇雪氏抄本”^⑤,乃平步青据沈复桤传抄本所录。平步青(1832-1896),字景荪,绍兴山阴安昌平家渚人。平氏抄本扉页题:“章氏遗书,宣统二年杏花朝日,雪士书眉。”版心下方有“安越堂”字样。抄本目录前有一条夹纸,云:“沈氏抄本每篇题下朱笔旁注,已刻成《戊申录稿》云云,殆即贻选^⑥序所云王氏编次与先生之手稿微有不同,故分别注于王氏目录之下。沈氏从杼思借得先生藏稿录入。”抄本内《为毕制府撰张太恭人墓表》文末有言:“志,沈氏抄本未全,候见原本是之。”安越堂是平步青的藏书楼,平步青所著《霞外攬屑》曾三次提过“潇雪”,应是平家女眷,清代藏书家有使用女眷抄书的风气。由于此抄本一直由私人收藏,所以它在历史上的作用有限。

沈复桤死后,王宗炎所订副本原本流落绍兴书坊。据《章学诚事略及遗书本末》所记,此书坊位于水澄巷。史载,光绪十八年(1888)水澄巷有三家书肆,

①章贻选:《上朱石君先生书》,《章学诚遗书》,第624页。

②李慈铭:《与谭仲修书》,《越缦堂诗文集·骈体文》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09页。

③同治八年二月初四日,李慈铭始致信朱厚斋央求转借实斋文集抄本,此后,在三月十一日、十二日、十五日、三十日中又陆续借得杂著等,在五月之前李慈铭大体已将手稿读完(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6册,广陵书社,2004年,第4307、4353、4358、4366页)。这与同治八年五月《与谭仲修书》所言“秘不肯出,不得尽见”章学诚遗著有出入。或是李慈铭向谭献晦言借书之事。

④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53页。

⑤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藏,索书号:8596。

⑥案,误,应是章华绂。

分别是奎照楼、墨润堂、会文堂^①。与此副本发生过关联者只有会稽徐友兰墨润堂,现浙江图书馆就藏有一部徐友兰铸学斋抄本^②。徐友兰家族不仅经营书坊、开放藏书楼,还在学术上有深厚的造诣,都十分推崇章学诚。徐友兰抄有《信摭》一卷,徐友兰子徐维则从山阴周星诒处抄得一册《实斋杂稿》^③,徐友兰弟徐树兰还购买了章季真于贵阳刊刻的《文史通义》书版并再版印刷,而最早刊刻且影响胡适撰写《实斋年谱》较大的《章氏遗书》就是出自徐友兰藏本。此时,年少的蔡元培在为徐维则作伴读,在阅读完《章实斋遗书》后,开始与薛郎轩等友人践行章学诚史籍中人地名应有详细检目的主张,从而使徐友兰所藏《遗书》成为孕育蔡元培等人编二十四史索引运动的一个思想渊源^④。

要之,以上这些抄本流传的地域范围并不广,仅限于绍兴一府之内,而且主要在藏书家和地方上有名望的学者间传抄。然而,在当时浙江流传的章氏遗书不止王宗炎编订本,还有其他一些来源不一的传抄本。如,嘉善周震荣将章学诚所寄文稿编为一帙的《实斋文略》,后由其孙周尔墉承藏^⑤。又如,较刻本《文史通义》多出《杂说》两篇的朱澂结一庐抄本^⑥,等等。这些抄本、传抄本共同构成当时浙江学人搜讨、研读章学诚著作的重要文献线索。

章善庆将《遗书》从绍兴书坊购归上海后,《章实斋遗书》才开始突破绍兴一隅,向更广阔的地域传播。首先接触此副本者为章寿康,其次是萧穆。章寿康因候补知县停留武昌,将《遗书》带入以彭祖贤、柯逢时为核心的关系圈,经柯逢时到缪荃孙、章法护、姚陛闻,再由缪荃孙到章贻贤、储伯约、李祥等人^⑦,不断进行复制。而且章寿康在上海滞留期间,还将此书的消息告知身在杭州的谭献^⑧,从而使《遗书》在浙江、湖北、北京等地流布。萧穆不仅从章善庆处抄出数卷未刊文字,还于光绪十八年得到一部三十卷《遗书》传抄本^⑨。受萧穆的影响,以上海醉六堂书商吴申甫为中介,周文桂、沈曾植、刘承幹等人先后接触到这部副本。最后经刘承幹将诸抄本集大成,在王秉恩、孙德谦协助下予以刊刻,成就了一部当时的“全本”。之后,王宗炎所订副本便成为学者研讨章学诚学术思想的一部全面而重要的文献。

缪荃孙札提到杨寿昌想刻遗书,实则提出刻此书者不止他一人,还有李慈

①鲁先进:《绍兴墨润堂创建人及创建年代考述》,《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1年第2期。

②浙江图书馆编:《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18页。

③《谭献日记》,第308页。

④《蔡元培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17、18、22页。

⑤周尔墉:《〈文史通义〉识语》,《章学诚遗书》,第622页。

⑥《谭献日记》,第188页。

⑦《缪荃孙全集·日记》第1册,第346、362、541页。

⑧《谭献日记》,第308页。

⑨萧穆:《校刊湖北通志检存稿序》,《敬孚类稿》卷二,第78页。

铭^①,只是二人都未果。1922年,刘承幹在刻《遗书》前征询缪荃孙的意见。缪荃孙对此书在当时的价值给予一个定位,即“《章氏遗书》高出《居稽录》百倍,然阁下刻《宋会要》单行,尤要于章氏书”^②。这个定位从出版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在同光年间不断有人提议刻《章氏遗书》却没能实现的问题。是因为当时不断有更新更重要的历史资料涌现,牵引学者的目光。可见,出版价值的抉择亦是影响章学诚著作流传的一个重要因素。

柯、缪二人传抄的《遗书》虽不多见,但在推动学术研究方面,还是留下了具体的历史痕迹。陶存煦(1913-1933),浙江绍兴陶堰镇人,曾入无锡国学专科学校,从钱基博受学。钱基博所著《〈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对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做过全面的评介。他将陶存煦视为最得意弟子之一,曾言“吾自讲学大江南北以来”,“于《文史通义》得陶生存煦”^③。陶存煦确实不负他所望,撰写出多篇有关章学诚的论文,如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论文《章学诚学案》,以及《刘承幹校刻的〈章氏遗书〉》^④、《胡适、姚名达〈章实斋先生年谱〉举正》等^⑤。在后两篇论文中,陶存煦据章贻贤所抄缪荃孙藏本《实斋遗书》,批评刘承幹所刻《章实斋遗书》偏离了章学诚编订遗书的本意,还补正《实斋年谱》诸多失误之处,从而在具体的学术层面深化了章学诚学术的研究。

四、余论

总括以上的分析,《章实斋遗书》从绍兴私人藏书楼中流出,先进入浙江学人的视野。受彭祖贤倡修《湖北通志》影响,此副本引起两湖一带学人重视并加以利用,为编修《通志》提供材料与体例的借鉴。柯逢时、缪荃孙等人的传抄,又使得《章实斋遗书》在晚清民初由浙江、湖北转入北京,从而与学界兴起的《文史通义》研究形成前后呼应之势。晚清较早开始教习章学诚著作的学者为谭献。谭献最服膺章学诚,曾将挽救每况日下的士风寄予在《文史通义》上^⑥,只因学力有限,无法影响世人,便开始教育子弟^⑦。包括章太炎在内,江浙、两湖一带许多学者受谭献影响开始研读《文史通义》^⑧。章太炎在第三次流亡日本(1906-1911)的最后两年,亦将《文史通义》讲授给留日学生,如朱希祖、

①李慈铭:《祥琴室日记》,《越縕堂日记》第6册,第4353页。

②缪荃孙:《致刘承幹》,《缪荃孙全集·诗文》第2册,第650页。

③此为钱基博在俞振振论文上的批语,转引自王承略:《恩师王绍曾——王绍曾先生的生平与学术》,《山东图书馆季刊》2007年第3期,第2页。

④《图书评论》1933年第1卷第12期。

⑤《光华大学半月刊》1932年第3期。

⑥《谭献日记》,第54页。

⑦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55页。

⑧郭象升:《郭象升藏书题跋》,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7页。

钱玄同等。朱希祖“六经皆史材”的观点^①、钱玄同反思六经皆史的思想均源于此时^②。顾颉刚在1920年10月8日《致胡适之》的信中指出,章学诚“始由章太炎先生大昌其学”^③。章太炎及其弟子自日本归国后,大举进入北京,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亦将《文史通义》的影响范围由江浙、两湖一带转移至北京。民初,北京大学招生广告明载文科入学考试参考书为《文史通义》和《国故论衡》^④,以此衡量学生是否通中国学术之流变,就与章太炎弟子掌控北京大学文学院有关。可见,在胡适《章实斋年谱》未出版以前,有关章学诚遗著的研究已经在学术和文献两个领域内,有了相当程度的累积,为“章学诚热”的到来奠定了知识和文本的基础。

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香港科技大学博士候选人周玲的大力帮助,在此深表谢忱!

【作者简介】陈立军,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

①朱希祖:《〈文史通义〉札记序》,《史地丛刊》1922年第1卷第3期,第1页。

②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3、197页。

③《顾颉刚书信集》,中华书局,2011年,第284页。

④《申报》1918年6月22日第10版、1919年4月28日第11版。